

于角色弧光中 见自我来路与艺术归途

——本报记者对话“文华表演奖”获得者虞文兵

□ 全媒体记者 管炜

日前,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虞文兵凭借在黄梅戏《太阳山上》中李安本一角的精彩演绎,荣获第十八届文华表演奖。这是安徽省时隔十二年“再摘文华”。

作为每3年评选一次的行业标杆奖项,文华奖的竞争十分激烈,本届共评出10个表演奖,戏曲演员仅4席,虞文兵是其中唯一的男演员。近日,虞文兵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,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艺术世界。



虞文兵单人照片



虞文兵(第一排中间)在黄梅戏《太阳山上》饰演李安本

对话 1+1

获奖:一束光,照亮来时路,亦指明未来途

记者:首先衷心祝贺您荣获第十八届文华表演奖。这个奖项,是行业至高的认可,此刻,您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?

虞文兵:谢谢。首先我想在此感谢所有为这个戏付出过汗水的每一个人。因为我们是一台戏,所以这份荣誉是属于大家的。获奖那一刻,心情很复杂。聚光灯很亮,台下嘉宾和同行们的目光都汇聚过来,压力与荣幸并存。那一刻,我最先想到的,是很多个普通的日子——习惯早到剧院,在化妆间里安静准备。

第一次读《太阳山上》的剧本,我反复看了最后一幕,李安本那段长达11分钟的独唱。读着读着,眼泪就掉了下来。剧本里那个小人物的挣扎和转变,让我很有感触。我好像能看到一条崎岖的山路,很多像李安本一样的普通人,在时代的大背景下,努力地生存、抉择。我感觉,李安本的处境,和我自己,以及很多在奋斗的人们,在某种意义上是相通的。

这个奖对我个人来说,意义超出了荣誉本身。它更像是一次总结和一次提醒。它照亮了我过去十几年学戏、演戏的道路,那些付出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难;更重要的是,它像一座灯塔,让我更清楚地看到作为一名黄梅戏演员未来的责任。

角色:解剖一个“非典型英雄”的灵魂弧光

记者:李安本这个角色,与传统戏曲中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。您是如何理解并构建这个复杂人物的内核?

虞文兵:对,李安本的魅力恰恰在于他的“非典型性”。他不是一个天生的英雄,甚至可以说,他身上带着许多普通人都可能有的弱点:贪生怕死、精于算计,一个在乱世中只想保全自身的小电报员。他的起点非常低,是被命运裹挟着,被迫上了太阳山。但正是这种低起点,让他的蜕变显得格外真实和动人。

我理解他的核心,在于“人性的挣扎与苏醒”。他的转变,绝非一蹴而就的英雄主义觉醒,那不是真实的人性。那是一个被迫卷入历史洪流的小人物,在亲眼目睹了新四军战士们的牺牲、坚守和那份纯粹的理想信念之后,内心深处的良知被一点点唤醒的过程。我常常在脑海中用无形的线条去勾画他的“人物弧光”——这条弧线,起于卑微和自私,承于内心的矛盾与挣扎,转于关键事件中的震撼与感悟,最终合于精神的升华与舍生取义。这条弧光,不仅是他个人的成长轨迹,某种程度上,也隐喻了在那个烽火年代,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思想觉醒的缩影。

塑造:从外部技巧到内心体验的淬炼之路

记者:将这样一个内在世界如此丰富、转变层次如此分明的角色立在于舞台上,过程必定充满挑战。您能详细谈谈塑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困难,以及您是如何克服的吗?

虞文兵:这个过程,是一场漫长的跋涉。困难是多方面的,可以说是一次从“形似”到“神至”的艰难蜕变。初期,最大的困难在于打破“行当”的程式化束缚。黄梅戏,乃至所有戏曲,都讲究“程式”,一招一式都有法度。但李安本这个角色,很难简单地归入某个固定的行当。用老生的沉稳来演他前期的油滑,会显得呆板;若完全用丑角的夸张来表现,又会流于肤浅,失去人物后期的庄重。所以,我和导演团队首先做的,是为他设计了一套极其细腻的、渐进式的外部形体语言。

前期,他身形佝偻,含胸驼背,眼神总是闪烁不定,看人时习惯性地快速瞥一眼又立刻移开,动作幅度小且快,带着一种市井小民的警觉与狡黠。我们甚至刻意融入了一些丑行灵巧、略带滑稽的技法,比如他算计时手指的快速捻动,受惊时下意识的缩脖,来突出其不堪与窘迫。

中期,随着剧情推进,在与新四军战士的共处中,尤其是在经历了生死考验后,他的形体开始发生变化。背渐渐挺直了一些,眼神中闪烁的惊慌减少了,取而代之的是困惑与思考。

到了后期,当他完成精神蜕变,决定留下帮助新四军发出那封“最后的电波”时,他的站立姿态是沉稳如山的,步伐是坚定有力的,眼神是清澈而决绝的。这种外部形体的变化,是塑造人物弧光可见的“骨架”,需要演员对身体有极强的控制力,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块肌肉都要为角

色服务。

但仅仅有“骨架”是远远不够的。更深层次的困难,在于如何让角色的内心世界真实可信地流淌出来。真正的转折点,来自于一次生活与戏剧的残酷交织。去年,《太阳山上》即将参加一次大型演出,演出团队紧锣密鼓排练冲刺之际,我的父亲突然生病住院。

那段时间,我白天在排练场,是那个在命运重压下恐惧、挣扎、寻求生路的李安本;晚上赶到医院,我是在病房外走廊里,为至亲安危忧心忡忡、深感无力的儿子。

那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对可能失去的深切恐惧,那种个人在巨大变故面前的渺小感,与李安本初上太阳山时的惶惑、无助,在情感的内核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。那一刻我豁然开朗:李安本的“怕”,并非可耻的懦弱,而是人性中最真实、最本能的反响。他的成长,不是简单地摒弃了“怕”,而是在一种更崇高的信念感召下,理解了何为“无畏”,何为比个人生死更重要的东西。这份“感同身受”,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,它让我真正触摸到了李安本的灵魂。从此,我的表演不再是“演”一种情绪,而是从内心深处“流淌”出真实的情感。

共鸣:个人艺术成长与角色命运的相互映照

记者:您刚才提到个人经历与角色的共鸣,这是否意味着您个人的艺术成长轨迹,与李安本的精神蜕变之路,存在着某种奇妙的关系?

虞文兵:我常常觉得,演员和角色的相遇,是需要缘分的。李安本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来路。

我出生在望江的一个普通家庭,母亲曾是农村戏班的花旦,戏曲的种子在儿时的哼唱中就已埋下。记得初二那年,我独自离家,前往市里的黄梅戏校学习。初来乍到,我甚至连基本的调门都搞不清楚,第一次进练功房练功,就因为强度太大而晕倒。那个时候,我的世界很小,视野里装的都是自己的得失——能不能跟上课程,能不能不被同学笑话,能不能早日登台。这种状态,很像初上太阳山的李安本。

后来,我加入了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,从“学戏”到“唱戏”,实现了身份的转变;再后来,有幸进入中国戏曲学院深造,京昆艺术的严谨与博大,老师们的悉心教导,前辈艺术家的言传身教,让我逐渐明白了“戏比天大”的分量, (下转4版)